

近代尊孔卖国的典型——张之洞

政治经济学系学员 赵木林 黄乃潘 赵锡斌
黎育松 李文山 权芳楼

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年）曾任清王朝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军机大臣兼管学部等要职，“身系朝局疆寄之重者四十年”，是清末推行对外投降、对内镇压、坚持倒退、卖国求荣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政治路线的代表人物，而且是以“崇尚儒术，以教为政”而闻名的“儒臣”。在他身上，近代尊孔卖国派的基本特征表现得十分露骨。解剖这具政治僵尸，对于认识林彪一类骗子的反动本质，颇有帮助。

给孔孟之道披上“合理”外衣的近代“儒臣”

张之洞出身在“三世为州县官”的官僚地主家庭。他父亲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贵州苗民起义，招募“义勇”，“冒死百战”，是一个杀人以“万计”的封建王朝的凶恶警犬。这个口念“仁政”、手执屠刀的孔孟信徒，十分注意教子读经，他购说经和朱熹之书“数十厨”，命张之洞苦读、纵观，认为“不解无妨，浸灌既多，长大后自有解者”。生活在这样一个反动家庭中的张之洞，九岁读完四书五经，从小浸透了孔孟之道的毒汁，年轻时就走上了维护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动道路。一八五四年，张之洞十八岁时，他父亲任贵州兴义知府，被起义农民围困城内，张之洞随父登城督战，抱着“杀身以成仁”的反革命信条，积薪城楼，声言“城陷即自焚”，充分暴露了这个儒家之徒早就是农民革命的死敌，反动制度的卫士。

张之洞登上政治舞台后，“以维持名教为已任”，始终扮演着董仲舒式的反动脚色。他“历官各省，无不以崇尚儒术、修明文教为先”。他鼓吹孔孟之道“参天而尽物”，是穷极一切的最高真理，提出“以圣道为准绳”，要用孔孟之道来统一人民的思想。为此，他大抓意识形态，大抓笔杆子，到处广辟书院，四方“延聘名儒”，并把“克己复礼”、“三纲五常”之类的谬论，“节录汇集，以成一书”，以之培养“出为名臣，处为名儒”的反革命接班人。当他临死前一个月，在病床上哀叹着“国运尽矣”的时候，还念念不忘孔老二“克己复礼”的遗训，挣扎着爬起来写下最后一道奏章，建议清王朝“保存国粹”，以挽救“道丧文敝，患气潜滋”的危局。

张之洞如此顽固地维护孔孟之道，狂热地推销孔孟之道，完全是出于反革命政治的需要。张之洞极力鼓吹“以教为政”，并打出“保国必须保孔教”的破旗。他的所谓“保国”，就是“尊朝廷，卫社稷”，而实际上就是维护那个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腐朽王朝，保住那个剥削阶级的天堂、劳动人民的地狱的国家。很明显，张之洞宣扬孔孟之道，是有意识地为推行倒退、复辟、卖国的政治路线服务。当时统治阶级对他的“以教为政”十分赞赏，夸奖

他“凡所设施，皆俨然有古大臣风”，堪称为“儒臣”。

作为近代“儒臣”，张之洞在推行孔孟之道上有其新的特点。对于“异教”，以往儒家是采取“罢黜百家”的政策，排斥一切，否定一切，而张之洞对于当时的“异教”——“西学”，即从西方传入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主主义文化，表面上则是“提倡”学习，认为“中学”（即孔学）和“西学”各有所长，“不可偏废”，“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又称“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但是，这个“中体西用”的“前辈先生的折衷”，正如鲁迅所揭露的，实质上是“本领要新，思想要旧”，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他“提倡”“西学”不过是为了保存孔孟之道。不仅如此，张之洞还认为在维护“三纲”这个反动精神支柱问题上，“西学”和中学是一致的。这似乎也是对于“西学”的肯定，然而，实际上这不过是歪曲“西学”以肯定孔学。在这方面，他所采用的具体手法也是颇有特征的。他批评主张“废三纲”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看重西国形式，而不吸其内容，不懂得“西人礼制虽略，而礼意未赏尽废”。他说西国总统有解散议院之权是“君为臣纲”，西人父母死了也穿孝服是“父为子纲”，西方妇女未参与政事是“夫为妻纲”！不难看出，在这里，是抽掉具体的阶级内容，把不同质的事物混为一谈。为了否认“西学”中存在的与“三纲”相对立的资产阶级反封建时期的“民权”、“自由”理论，张之洞还胡说什么“民权”、“自由”这两个词根本不可能存在，它是“华文不深者”误译、生造出来的。“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张之洞玩弄一大套如此卑鄙的手段是要“归纳”出什么结论来呢？结论就是：孔学的“道本”、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三纲”，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学说中“固有”的东西，从而是“天秩民彝，中外大同”的绝对真理。很显然，其目的不过是歪曲“西学”以证明孔学的正确，给孔学披上“合理”的外衣，以使用反动的孔孟之道来抵制、冒充当时的先进思想。

张之洞采取这种既狡猾又反动的手法来推销孔孟之道，是由近代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一八四〇年以后，帝国主义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国家变成了半殖民地的中国。这一事变暴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同时也就宣告了维护它的孔孟之道的破产。那时“先进的中国人”纷纷“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出现了“不讲西学则势不行”的历史潮流，这是“圣教”没落的反映。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拒绝“西学”只会暴露自己的顽固，这就迫使他不得不采用歪曲“西学”的手法来贩卖孔孟之道。今天，在马克思主义已成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林彪一类坚持复辟的尊孔派，“语录不离手”，而又用孔孟之道来冒充马克思主义，同样是合乎阶级斗争规律的。

依靠帝国主义屠杀人民的刽子手

“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这两种职能体现在中国反动阶级的政治代表身上，就形成孔孟之道的吹鼓手和杀人如麻的刽子手的一身而二任的特征。张之洞就是一个典型。他在大肆贩卖孔孟之道以欺骗群众的同时，又大力建立反革命武装以镇压人民。张之洞以他的“兵事为儒学之至精”的“理论”为依据，抓枪杆子胜过抓笔杆子。他说：“练兵一事，鄙人身心性命之学。”这个“儒臣”和一切反动军阀一样，为了“指挥一切”，

“调动一切”，搞反革命专政，“他们都看重了‘有军则有权’的原则。”他们口口声声所说的“权”，是对人民的“镇压之权”。张之洞不同于封建时代的儒家之处，只是在于他借以行使“镇压之权”的反革命武装，是建立在依靠帝国主义的基础上。

一切反动派都是唯心主义的唯武器论者，中国近代的反动派屈服于帝国主义炮舰政策的压力，更是帝国主义新式武器的迷信者、崇拜者。张之洞就把洋枪洋炮视为清王朝赖以生存的命根子，他说：“自发捻削平以来，各省遂无大乱”，就是因为“洋枪洋炮流入中华，渐推渐广，官军所用，无论精粗，总系洋械，火器精利，声威震惊，乱民无抗拒之资，宵小弭孽芽之渐。”在这些反动派看来，只要在帝国主义现代化杀人武器的保护下，只要掌握了一两样新式武器，就可以左右人民，指挥历史。但是，要获得和使用新式武器，就得依靠帝国主义。不用说购买，就是张之洞仿造洋枪洋炮的枪炮厂以及为它提供原料的钢铁厂，也是聘洋人、借洋债、购洋机器建立起来的，而他用洋枪洋炮装备的军队，则是“募洋将管带操练”的。对此，他辩解说：“练兵之道，无权不行，若仍以华官为管带，……事事掣洋将之肘，教练必无实际。”为了用新式杀人武器，以镇压国内革命力量，把军事大权拱手送与帝国主义，这就是张之洞之流的近代反动派的“练兵之道”。

张之洞为了维护反动统治，正是凭借他靠洋枪洋炮、洋将洋弁建立起来的“新军”，挥舞着“镇压之权”的黑旗，大搞阶级报复，实行反革命血腥屠杀的。一八八四年，他派兵用“火箭火弹，前后围攻”海南黎族人民，一次就枪杀一百几十人。一九〇六年，他派遣“新军”，会合湖南、江西地方部队，“相机剿办”萍浏醴工农起义军，用他的洋枪洋炮杀害了一万多革命志士，充分暴露了这个“儒臣”是杀人不眨眼的“土屠”。对于冲击他的帝国主义主子的反洋教士运动和伟大的义和团运动，张之洞更是直接勾结帝国主义，疯狂地进行镇压。他用尽肮脏语言，污蔑他们是“乱民”、“土匪”“劫盗”、“邪教”；怀着刻骨仇恨，力主清廷“开枪轰击”。在他的管辖区内，他下令：“如有造谣闹教之人，立即严拿正法”，而且，“无论首从，均即正法”，“不服弹压者，准兵勇当场枪杀”，杀气腾腾，凶相毕露。为了阻止义和团革命势力南下，他与帝国主义订立“东南互保条约”，公开与帝国主义结成反动同盟。与此同时，他又暗中勾结帝国主义，想趁天下大乱之机，在南方搞封建割据。

勾结帝国主义，依靠帝国主义的新式武器，屠杀中国人民，这是张之洞之流的近代儒家区别于以往儒家杀人的一个特点，也是中国近代乃至现代一切反动派杀人的一个特点。现代大屠杀蒋介石，“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的男女老少”。林彪不也想步张之洞、蒋介石的后尘，要借助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核武器，“钳制”国内革命力量，大规模屠杀革命人民吗？毛主席指出：“中国软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没有后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对于绞杀革命这样的大事就更是如此。正是由于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既要反对革命而本身作为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又极为虚弱，决定了它的政治代表无一例外的是依靠帝国主义屠杀人民的刽子手。

打着“富民强国”旗号的卖国贼

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在于卖国勾当的时候，惯用的一个迷人诀窍，就是乔

装打扮，扯起“民富国强”一类的破旗，摇摇晃晃，以掩饰其卖国罪行。在这伙卖国贼中，张之洞要算是旗子举得最高，卖国最为彻底的一个。在他的长篇累牍的官样文章中，充斥着“富民强国”、“自强求富”之类的陈词滥调，他甚至把他投靠帝国主义屠杀人民的丑行说成是“防止外洋，不如先清内匪”的自强爱国的壮举！帝国主义也夸奖这个奴才是“杰出的真正的爱国者”！然而，漂亮的谎言是遮掩不住丑恶的咀脸的。大量事实说明，张之洞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汉奸、大卖国贼，而且是老沙皇的可耻的辩护士和标准的奴才。

张之洞的卖国是多方面的，从个别企业到全国领土，从经济到政治，无所不包。为了迎合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需要，他以办“洋务”为名，行出卖之实，把企业经营管理大权送与洋人，把铁路、矿山、钢铁厂等重要经济命脉抵押给洋行，把祖国资源卖与洋商，肆无忌惮地推行着一条洋奴哲学的卖国路线。他极力鼓吹帝国主义侵略“有功”的谬论，把帝国主义在华设厂严重扼杀中国民族工业、残酷剥削中国人民的罪恶行径吹捧为“华民既沾其利，又晓其工，则华商购机制造之厂必不能绝”，为帝国主义资本输出鸣锣开道。在政治上，他提出“甘以重利饵他国”的卖国投降路线。在帝国主义多次侵华战争中，他都主张割地、赔款，以求得“东方太平之局”。中日甲午之战后，他拒不支援奋起反抗割弃祖国领土的台湾军民，并要他们放下武器，甘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顺民。一八九七年，他提出将大连“明许各国作商埠”，并主张将“舟山许英”。直到他死前不久，还丧心病狂地推销日本贵族院议长提出的把我国东北作为帝国主义列强共有的殖民地的“共管计划”，说这是“辽东三省亿万年永为我大清国所有”的“要策”，而且说它“为内地十八省改行新法之开端式样”，实际上，就是要把整个中国双手奉送给帝国主义共管，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下的殖民地。这一切就是所谓的“富民强国”！口称“富民”，实际害民；高谈“强国”，阴谋卖国，这就是卖国贼张之洞的真面目。

张之洞卖身投靠老沙皇的卑劣行径，更是他汉奸、卖国贼嘴脸的大暴露。他曾向清廷建议：沙俄关于“商务”、“界务”的一切侵略要求，均应“酌予通融”，“全部应允”；并主张“如俄国用兵东方，水师则助其煤粮，其兵船可入我船坞修理；陆路则许其假道，供其资粮车马”。总之，凡是老沙皇所需要的“一切”，都应“量为协济”。他说，这样“结援”沙俄，“若中国有事”，它“可以立发兵舰数十艘，游行东方海面”。十分清楚，张之洞的这个“救急之要策”，不过是跪倒在老沙皇膝下，变中国为沙俄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以求得老沙皇的炮舰保护伞。为了兜售这个彻头彻尾的卖国方案，张之洞极力掩盖沙俄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拚命为老沙皇擦脂抹粉。他把早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就派兵侵占我黑龙江流域、以后又多次发动侵略战争、夺走我国上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沙俄帝国主义，颂扬为是什么和平友好的“盟聘邻邦”；把按照沙皇“用武力加以镇压，把他们居住的地方变为废墟”的训令而毁村灭户的侵略军的强盗罪行，美化为什么“其举动阔大磊落”。真是无耻到了极点！凡是用谎言嘲弄历史的人，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张之洞这个可耻的卖国贼，早已被中国人民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今天，正在重温老沙皇旧梦的新沙皇，公然无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沙皇俄国侵略罪行的揭露，颠倒黑白，篡改历史，编造出比中国老卖国贼的谬论更加离奇得多的谎言，声嘶力竭地为老沙皇及其侵略军歌功颂德，这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大暴露。

毛主席在批判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卖国主义时指出：“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事实正是这样。张之洞的同僚、军机大臣刚

毅有句遗臭万年的“名言”：“宁赠友邦，勿予家奴”。这就是说，在革命和亡国之间，他们宁肯选择亡国。因为，革命意味着他们整个阶级的覆灭；而亡国，则不会损害他们的根本利益。对这点，张之洞作了最明确而又最无耻的表白，当有人问他帝国主义分割中国后“将何以自处”时，他回答：“虽分割之后，亦当有小朝廷，吾终不失为小朝廷之大臣也。”这就不难理解，在革命风暴时期，张之洞这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会主张帝国主义共管中国，会躲到老沙皇炮舰保护伞下。至于所谓“民富国强”之类的旗号，不过是为他们当“小朝廷之大臣”、当“儿皇帝”的丑恶嘴脸盖上的的一块时髦的遮羞布，目的则在欺骗群众，以推行投降卖国路线。林彪虽然和张之洞相隔半个多世纪，但是，在卖国问题上，无论他们打着的旗号，还是推行的路线，都极其相似，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是同一个阶级、即腐朽没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

启 事

一、本刊一九七五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上半年出季刊，下半年改出双月刊，逢单月出版，全年共出五期，每期定价0.25元，全年1.25元。凡需订阅者，请按规定到当地邮局办理订阅手续，以免误时脱订。本刊编辑部不办理零售和订阅手续，请勿将现款或邮票寄给我们。

二、来稿凡引用经典著作语录，请注明出处。

三、来稿如不采用，一般不复信、不退稿，请读者自留底稿。

本刊编辑部